

漢陽戰役對辛亥革命的影響

廖隆盛

一、前言

西元一九一一年在武昌爆發的辛亥革命，雖然數月之間便推翻了滿清，從而結束了數千年君主專制體制，揭開了中國共和政治的新頁；因而有的學者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可以與秦併六國，廢封建、行郡縣的影響差堪比擬的一次革命（註一），但是由於民國政權不久落入專制餘孽的袁世凱手中，革命黨人的建國理想不僅未能推展，反而隨著討袁失敗，革新勢力遭受全面挫敗，遂有袁世凱竊國稱帝、北洋軍閥鑄武亂政等政治社會的逆轉與動亂；所以也有人認為辛亥革命是悲劇的結局，是失敗的革命（註二）。就革命運動倡導人孫中山的看法而言，他強調破壞工作完成之後，必須進行更艱苦的建設工作，因此他倡言三民主義，就是除了排滿的民族革命外，還有民權主義的政治革命和民生主義的社會革命。他說：「這三樣有一樣做不到，也不是我們的本意。」（註三）可見就原有理想而論，辛亥革命確實不是一次成功的革命了。至於何以造成革命理想的落空，孫中山在民國十二年

- 註一：陳福霖：〈評薛君度：黃興與中國革命〉，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文集》第三輯，頁一三八。
- 註二：張磊：〈列寧論辛亥革命〉，《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冊，頁一八。
- 註三：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等備委員會學術編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一冊，頁一七八。

曾檢討稱：

此役（辛亥革命）所得之結果，一為滌盪二百六十餘年之恥辱，使國內諸民族一律平等，無復軋鎔凌制之象。二為剷除四千餘年君主專制之跡，使民主政治於以開始。：然以此役遂足現中華民國之實乎？則大謬不然，於何証之？以十二年來之已事証之。十二年來，所以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者，皆此役階之厲也。舉世之人，方疾首蹙額以求其原因而不可得，余請以簡單之一語而說明之，曰：此不行革命方略之過也。革命方略，前已言之，規定革命之進行時期為三：第一軍政時期，第二訓政時期，第三憲政時期。此為滌盪舊污，促進新治，所必要之歷程，不容一缺者也。民國之所以為民國，胥賴於此。不幸辛亥革命之役，忽視革命方略，置而不議，格而不行，：民國遂無所持以為進行，此真可太息痛恨者也（註四）。

案軍政、訓政、憲政三期革命方略為同盟會成立時，由孫中山所提出，見於同盟會發表的軍政府宣言中，成爲革命主張的一部分。但在孫當選臨時大總統，組成民國政府時，卻無法按其主張推行，而迅速與袁世凱達成和議，讓出政權。這一點孫中山說：

乃於民國建元之初，予則竭力主張施行革命方略，以達成革命建國之目的，實行三民主義。而吾黨之士多期以爲不可。經余曉喻再三，辯論再四，卒無成效。莫不以爲余之理想太高。：予於是乎不禁爲之心灰意冷矣。：此予所以萌退志，而於南京政府成立之後，仍繼續停戰，重開和議也（註五）。

顯然辛亥革命之際，聯袁倒滿，讓政於袁的南北和議是孫中山的革命方略被迫放棄，導致辛亥革命失敗的癥結。

對於辛亥革命時期的南北和議及革命轉折的問題向爲學者所注意，或從立憲派的活動討論，或從袁世凱的權謀

四：《國父全書》，頁一〇四五。

五：同上註，頁二一。

分析，或從列強的干預探討，皆有助於對辛亥革命的瞭解。但就史實而論，革命初起，各省響應相繼，重要黨人對革命前途頗為樂觀，即使在漢口失陷後，黨人對和議的態度仍甚強硬。直到漢陽之役失敗，黃興東走，情勢乃急轉直下，不但民軍內部萌生紛歧，而聯袁讓政，換取共和之方針亦定。可見漢陽戰役之敗，對辛亥革命黨人之士氣打擊與情勢之轉折，影響至為深巨。本文之作，即擬就漢陽戰役的要況，民、清兩軍乃至袁世凱各方在戰前戰後的策略與立場變化，及其對革命黨人和議態度轉移的影響，加以探討，期能有助於進一步瞭解辛亥革命。

二、漢陽戰役的重要經過與分析

革命軍起事，佔領武昌城後，成立湖北軍政府，擁護黎元洪為都督，接著漢陽、漢口先後為革命軍所據。當時財政方面，武昌省庫（藩庫）存銀一百二十萬兩；銅幣局存銀元七十餘萬元、銀八十萬兩、銅元四十萬串；官錢局存銅元二百萬串、官票八百萬張、未蓋印者一千萬張，銀元票二百四十萬張、庫銀二十萬兩、銀元三十萬元。總計存款達四千萬元。革命政府的軍政餉費甚為充裕。軍械彈藥方面，漢陽兵工廠存槍枝已完成者八千餘枝，零件齊全而未上托者九萬餘枝，造而未完成者二萬餘枝。步槍子彈三十餘萬發。大砲將成者二十餘尊，砲彈約十萬發。不但使武昌革命政府可以擴軍備戰，甚至後來湖南、九江獨立，也得到撥助（註六）。武器與經費充足，是武昌革命的優越條件。

武昌起事，是由新軍發動。當時湖北新軍建制為第八鎮（統制張彪）和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黎元洪），共有步兵六標（團），並配有砲兵、騎兵、工程、輜重等部隊，合計約一萬五千人（註七）。這時有一標又兩營隨端方入川鎮壓鐵路風潮，另有部分分駐其他各地。留駐武漢地區者約八千人，而且主要集中於武昌。其中純粹革命黨約

註六：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二編，第一冊，頁三八六—三八九。

註七：劉鳳翰：《論新軍與辛亥革命》，《近代中國》第二十六期，頁三九。

近二千人，同情革命者約四千人（註八）。

軍政府成立，首由黨人蔡濟民等十五人組成謀略處，籌劃各事（註九）。爲應付戰局，以舊有新軍爲基幹，擴大兵額、編爲步隊五協（旅）、砲隊三標（圍）、馬隊一標、工程一營、輜重隊一營、敢死隊三隊（註一〇）。分別以吳兆麟（後改爲宋錫金）、何錫藩、成炳榮、張廷輔、熊秉坤爲協統（註一一）。第一協防守漢陽，第二協佈署漢口，準備迎擊清軍，伺機向北進攻，第三協防禦武昌沿江地區，第四協防守武昌省城，第五協整備隊伍，準備赴援漢口（註一二）。

清軍方面，第八鎮統制張彪率領從武昌退出的部隊加上部分從河南來援的軍隊約二千人，集中在漢口下游的劉家廟車站，等待清軍主力到來（註一三）。清廷接到武昌被革命軍佔領的報告，除停止「永平秋操」演習之外，立即採行緊急措施，將瑞澂革職，仍命戴罪立功。河南派兵一協，星夜增援武漢。北洋第二、第四鎮各一部兼程赴漢口，海軍提督薩鎮冰率艦駛鄂。以陸軍大臣廢昌爲欽差大臣，節制湖北各軍及增援部隊。

北洋軍南下，輸運整備需時，加以起用袁世凱的問題未決，北洋將領猶抱觀望拖延的態度，故軍隊難以迅速南下。而革命軍初亦忙於控制武漢秩序，增募新兵，建立組織，故三鎮光復後一星期，民、清之間尙無戰事。到十月十八日（陽曆，下同）上午，漢口革命軍始向劉家廟進攻，清軍頗有死傷，次日革命軍佔領劉家廟及江岸車站。二

註八：黃鴻階：〈辛亥革命醞釀時期的回憶〉，〈辛亥首義回憶錄第一輯〉，頁一二一。陳旭麓、勞紹華：〈清末的新軍與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頁一六四。

註九：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二編，第一冊，頁三九八。
註一〇：胡祖舜：〈六十談往〉，《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二編，第一冊，頁四〇二。

一一：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同前書，頁四〇二。

一二：金沖及、胡繼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三卷，頁一七二。

註一三：同前書，頁一七四。

十、二十一日，革命軍繼續發起攻勢，但無進展，成對峙之勢（註一四）。

十月下旬，清軍陸續開到，而湖南、陝西、江西等地相繼響應革命，清廷被迫屈從袁世凱的要脅，二十七日，援袁為欽差大臣，統籌全局，召廢昌回京。並重組前敵部署，以袁部馮國璋統第一軍，段祺瑞統第二軍。清軍勢力一振。袁為展現實力、施壓革命，遂對革命軍採取攻勢，而革命軍亦增調第四、五協赴漢口作戰。因此二十八日以後，連日激戰。由於北洋精銳陸續開到，革命軍主力犧牲頗重，轉處不利，被迫退至市中心區。此時革命領袖黃興趕抵武昌（二十八日），亦即渡江督軍作戰，數日間，雙方爭奪慘烈。至十一月一日，馮國璋下令火焚市區、鬧市化為焦土，黃興等被迫撤退，次日，漢口遂陷。

漢口之役，戰況慘烈，民清兩軍各死傷二千餘人（註一五），雙方均須重整軍備，故此後十餘日，在軍事上，隔江對峙，無激烈戰鬥。

漢口失陷，黃興及民軍的戰志士氣未懈。十一月二日，黃興在武昌參加軍政府會議並報告軍情。軍政府決議全力建防禦漢陽，保衛武昌。為統一指揮，激勵士氣，特任黃興為民軍戰時總司令，並於次日行登壇拜將古禮（註一六）。禮成之後，黃即往漢陽，設總司令部於城內之昭忠祠，布署防務。為增強軍力，先後增募步兵三協（註一七）。獨立後的湖南也派援軍第一、二協開到（註一八）。黃興和漢陽各部皆甚振奮，認為有轉敗為勝之機。

漢陽在武漢三鎮中，有其軍事上的重要性。因為漢陽的龜山在三鎮中，地勢最高，佔領漢陽，可俯瞰武漢。所以清軍佔漢口後，袁一方面派員以君主立憲招誘民軍，一方面則積極增補，準備進攻漢陽。民軍方面，則因十一月

註一四：同註九，頁四六六。

註一五：教育部主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一編，第二冊，頁六九七。

註一六：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二三三。

註一七：同註九，頁四〇三。

註一八：同註十二，頁一八五。

六日，北方志士吳祿貞被殺，不少黨人甚為憤激，誓言北伐雪恨，也有部分黨人認為與其待敵軍兵力充實後來攻，不如乘其兵力未充，先發動進攻（註一九）。由於黃興也主張反攻漢口（註二〇），此議遂得軍政府同意。

十一月十六日晚上，黃興分兵三路向漢口進攻。第一路從武昌青山渡江攻劉家廟，第二路乘船由漢陽東北岸向漢口龍王廟強行登陸，佔據陣地後相機進攻。第三路由駐漢陽各軍組成，由黃興指揮，為反攻之主力，兵力包括來援的湘軍兩協及熊秉坤之第五協與砲兵、工程等營（註二一）。但適逢大雨，道路泥濘，部隊行進緩慢，過渡時，舉火照明，或彼此相詢，清軍發覺，遂予射擊。民軍雖相繼渡河，但已失拂曉突擊的效果，推進亦極困難。次日下午，清軍增援大砲、機關槍，集中射擊，民軍火力不如，左翼甘興典部湘軍首先潰退，無法遏止，且因爭渡浮橋，溺水死者數百。其他各部也只好撤退過河（註二二）。反攻漢口之役遂敗。而且民軍在此次戰鬥中，暴露了弱點，以致助長了清軍氣勢，謀大舉來攻。

民軍反攻漢口失敗後，專事固守漢陽。清軍方面，由於灤州兵變的影響，袁世凱奉命入京入閣，取得清廷實權。為施壓民軍，便於操縱南北，遂有進攻漢陽之舉。十一月二十日，清軍分兩處從漢水上游渡河，東攻漢陽。經過數日激戰，民軍火力不如，逐漸敗退，三眼橋、琴斷口、美娘山等城西險要相繼失陷。民軍雖作最後努力，以敢死隊及增援的湘軍極力反攻，但清軍以重砲猛烈轟擊，「敵炮精利，發程十數里，我無與當者」。（註二三）民軍犧牲慘重，陣地得而復失。二十七日，另一路清軍又由漢口渡河，佔領了漢陽兵工廠和鐵廠，正與黃興談話的副參謀長楊靈章也中砲陣亡，漢陽城內已無險可守。傍晚，黃興被迫率司令部人員渡江，退往武昌（註二四）。漢陽繼

註一九：李書城：〈辛亥革命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湖南文獻季刊》，第三卷第二期，頁四四。

註二〇：李春萱：〈辛亥首義紀事本末〉，《辛亥首義回憶錄》，第二輯，頁一九六。

註二一：李西屏：〈武昌首義記事〉，《辛亥首義回憶錄》第四輯，頁六五。

註二二：同註十二，頁一八七。

註二三：同註二一，頁六九。

註二十四：同註十二，頁一九一。

漢口之後，爲清軍所奪。

漢陽既陷，武昌孤危，黃興東去上海，黎元洪亦失信心，旋因都督府中彈，逕自離城避敵（註二五）。清將馮國璋擬乘勝奪取武昌，但袁別有所圖，去電制止，進而提議兩軍停戰。民軍既難再戰，即接受其議，武漢戰事遂停。

漢陽防禦戰事，從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歷時十天，民軍軍官陣亡者一百三十七人，傷八十五人，士兵陣亡者二千六百九十三人，傷四百餘人（註二六）。戰鬥之慘烈，可以概見。但，以如此激烈之抵抗，重大之犧牲，終不免於失城敗戰，檢討戰事，可以發現相對於素練之北洋軍，民軍實有嚴重弱點。

（一）民軍裝備戰力不如北洋軍：

清末新軍的創建，是在甲午戰後。由於甲午戰爭的挫敗，「一時內外交章，爭獻練兵之策，於是北洋有新建軍，南洋有自強軍，是爲練新軍之始。」（註二七）北洋最初的新建軍起於一八九五年由胡燏芬在天津小站練兵，成十營，號定武軍（註二八）。不久改由袁世凱接辦，改稱新建陸軍，擴充規模。章程裝備悉照西法（註二九）。南洋的自強軍始於甲午戰爭時，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就近衛護軍中選士兵二千餘名，成立自強軍，營制彷彿德國，聘請德人統領教練（註三〇）。次年，張之洞回湖廣總督本任，又在湖北成立新軍，仍以德人擔任教習，是爲湖北

註 二五：蔡寄鷗：《鄂州血史》，《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冊，頁八一〇。

註 二六：同註十五，頁七一〇。

註 二七：《清朝續文獻通考》，兵考二，頁三一六。

註 二八：《清史稿列傳》，頁二二九。

註 二九：《東華錄》光緒朝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頁二二。

註 三〇：《辛亥革命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頁一五〇。

訓練新軍的開始（註三一）。八國聯軍之役以後，清廷編練新軍更為積極，並因北洋、湖北訓練新軍粗具規模，就此推廣。命華北之河南、山西、山東各省向北洋學習，江蘇、皖、贛、湖南各省赴湖北學習（註三二）。但北洋顯然在清廷心目中視為中央軍，故更為重視，袁世凱亦野心勃勃，遂以全國餉力，到一九〇五年，共成立北洋六鎮，總兵力七萬餘人。湖北則以清廷不願疆吏擁重兵，只許設立一鎮一協，兵力一萬餘人（註三三）。規模較北洋大有不如。

再就軍隊素質而論，有學者以兵源、幹部、裝備、訓練、戰場經驗，以及兵員滿額與否，作為評定標準，將各地新軍區分為優、良、佳、可、差五級，而優級四鎮，全屬北洋軍。良級四鎮則包括北洋之第一、五、二十鎮，及湖北之第八鎮。黎元洪之第二十一混成協則列為中等之佳級。辛亥時，來武漢作戰之北洋軍為二、四兩鎮。其中第二鎮且為新軍最早訓練成功之部隊，許多地方新軍編練皆以此鎮為模範。可見軍隊素質上，北洋居於優勢（註三四）。而裝備火力方面，北洋軍以中央財力經營，亦非湖北新軍所能及。故漢陽保衛戰中，革命軍深感「敵炮精利，發程十餘里，我無與當者。」（註三五）黃興也指出：「我軍只有步槍而無機關槍，且只有山砲，亦不能抵禦敵方之管退砲，故此較敵人損失為重。」（註三六）

註三一：同前書，頁一五一。

註三二：同前書，頁一五三。

註三三：同註七。

註三四：同註七，頁四二。

註三五：同註二三。

註三六：同註十九，頁四二。

(二) 民軍新募之兵未遑精練

武昌起事，新軍參加革命者及響應者約五、六千人（註三七），為應付戰局，大量增募新兵，未及精練，即用以臨敵作戰，故難發揮戰力。「與敵槍砲齊施，新兵在后者見子彈紛飛，以為敵軍且至，急開槍射擊，未經訓練，不知伏地作戰，多立而發射，因是發彈大抵皆中自方前衛。且直立陣地，目標顯然，易為敵所擊中。」（註三八）同時軍官不足，多由弁目提升，也影響指揮能力。

(三) 部分靠攏革命之中上級軍官未真誠效力，甚至臨陣退卻

武昌新軍之革命運動，為求保密，極少吸收軍官參加，加以起事時，中上軍官逃避一空，下級軍官留者亦極少（註三九），故原有軍官，只要輸誠革命，皆得重用。但其中不乏心懷二意，破壞戰局之輩。如宋錫金原為隊官（連長），漢陽起事，臨時與黨人合作（註四〇），民軍擴編，任第一協協統（旅長），防守漢陽，卻在漢口危急時，擅自撤往湖南，後被軍政府處死（註四一）。又張景良原為管帶（營長），軍政府成立，任參謀部長要職，於漢口劉家廟戰役擔任進攻指揮官，既不臨陣，也不部署，致陣地潰敗，甚且暗與張彪參謀連結，別有圖謀。事雖為軍政府查明，將其處決，但已誤事不少（註四二）。又如成炳榮為前督練所課員，投靠革命，任第三協協統，反攻

註 三七：同註八。

註 三八：逸民：《辛壬聞見錄》，《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史料輯錄》，頁十七。

註 三九：曹亞伯：《武昌起義》，《辛亥革命資料叢刊》第五冊，頁一六一。

註 四〇：同註六，頁三八八。

註 四一：同前書，頁三九四。

註 四二：崇漢堂：《湖北軍政府和它的革命政策》，《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論文集》上冊，頁八〇九。

漢口之役，奉命渡江攻劉家廟，竟喝醉酒，下錯命令，反向行進，致計劃未能執行（註四三）。另有標統楊選青，竟因在家結婚，未率軍執行任務而遭處死（註四四）。其他如羅家炎原為隊官，擔任運輸委員，涉資敵被殺；姜明經繼張景良為總指揮，卻午夜潛逃，至兵士潰散（註四五）。凡此皆屢次嚴重影響民軍戰局與士氣。

四 地域觀念影響作戰協調

經漢口一役的損耗，民軍兵力已明顯不支，加以宋錫全率隊撤走，情況更為嚴重，為保衛漢陽，軍政府只有再增募新兵，補充戰力。幸而這時湖南援軍第一協、第二協先後開到，遂倚為防守漢陽的主力，統帥黃興也大為振奮（註四六），而有反攻漢口之舉。不料兩湖民軍很快就有了隔閡，湖北士兵每人發十元，湖南只發七元（註四七）。反攻漢口時，因遇雨，湘軍甘興典部竟紛紛各自避雨，費了許多工夫，才把他們集中起來，催促前進，以致誤了戰機（註四八），但略遇砲火，該部即帶頭奔退，甚至要向攔阻後退的人開槍，遂至全線敗退。而甘興典並未退回原防，竟自掠民舟，載隊逕返湖南（註四九）。另一支湘軍王隆中部，戰力較佳，但在漢陽激戰時，也以連日作戰，兵士疲勞為由，擅離漢陽，退往武昌（註五〇）。防守陣線因而迅速為清軍突破。

註 四三：同註十二，頁一八七。

註 四四：同前註。

註 四五：同註六，頁三九五。又熊秉坤：《民軍第五協軍事實錄：陣中日記》，《湖北文史資料》第四輯，頁十七。

註 四六：同註十二，頁一八五。

註 四七：同註十二，頁一九〇。

註 四八：焦達峰：《我所經歷和瞭解的武昌首義》，《湖北文史資料》第一輯，頁一九二。

註 四九：同註三八，頁二四。

註 五〇：同註十九，頁四五。

漢陽戰役，民軍雖嚴重挫敗，漢陽失守，但前後與清軍相持二十四日，若從漢口保衛戰算起，更達四十九天。這一個半月間，武漢一方面成爲號召各省響應的燈塔，另一方面，因清軍主力專注於此，無暇他顧，各自的革命勢力也得以順利發展，十餘省相繼光復。漢陽雖陷，長江以南，清廷已剩南京孤城，五天後也被革命軍佔領。所以漢陽戰役在辛亥革命中，實有偉大的貢獻，不能以最後的失敗否定黃興的功績。然而無論如何，在這場與北洋軍的主力決戰，革命軍已告失敗，以武力推翻清廷，面臨嚴重困難，爲求光復漢族，建立民國，革命軍的進展，即將產生無可避免的轉折。

二、漢陽戰役對南北議和的影響

漢陽經力戰而陷，最大的影響就是使民軍在被北洋軍擊敗後，失去武力倒清的信心，轉而趨於妥協，圖以讓予民國總統爲條件，換取袁世凱的合作，推倒清廷。

武昌起事之初，順利佔有三鎮，又有湘、粵即將繼起的傳言，所以黨人莫不激奮，對革命發展深懷熱望。如孫中山在美國即命芝加哥同志在十月十五日開預祝中華民國成立大會，並親擬「預祝中華民國成立布告」。（註五一）而蔡元培更爲之喜而不寐，認爲革命形勢，「必將勢如破竹」。（註五二）其他重要黨人，居正、譚人鳳、宋教仁、黃興等更紛紛趕赴武漢，參與軍政大計。革命軍亦積極佈署，有北伐先佔武勝關之議。但是清廷爲收拾局勢，很快宣佈起用經營北洋軍多年的袁世凱，情勢遂爲之一變。

袁於宣統初立，被廢黜閒居，武昌革命爆發，突然給他帶來重掌權勢的機會。但他已有乘機別圖之意，不但向清廷要脅軍、財大權，在南下督師時，更表示「余甚穩健，對革命黨決不虐待」。（註五三）其策略顯然就是對革

註五一：陳哲三：〈辛亥武昌起義後歐美黨人的活動〉，《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十二卷第一期，頁三一。

註五二：蔡元培致吳稚暉函，引見同前註。

註五三：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四一一。

命軍適可而止，然後在清廷與革命軍之間，操縱運用，以革命勢力逼迫清廷屈從其欲，又以北洋優勢武力威壓革命軍，再從中勒索，取得最大的政治利益。

袁受任欽差大臣，南下督師時，即對民軍出以「招撫」的態勢，試探反應。十月二十九日，命與黎元洪有舊誼的鄂籍道員劉承恩致書元洪，提出和議主張，其書略云：

頃奉項城宮保諭開，刻下朝廷有旨：一、下罪已詔；二、實行立憲；三、赦黨禁；四、皇族不問政事等因。似此則國事尙有挽回之期也。遽即轉達台端，務宜設法和平了結，：否則兵連禍結，：迨至日久息事，則我國已成不可收拾之國矣（註五四）。

當時革命氣勢甚盛，且湘、陝、九江、太原、昆明皆已響應，為革命勢力所據，所以湖北民軍對此和議試探，反應態度強硬。軍政府會議時，雖有極少數人主張覆信談判，但吳兆麟等多數人主張不理。部分激烈黨人更擲指揮刀於會議席上，厲聲喝曰：「有再言覆信和平者，可視此刀。」（註五五）民軍這種強硬態度直到漢口失陷，軍事已受相當挫折後，仍未根本改變。當時黃興主持漢陽戰局，湖南援軍開到，計劃反攻漢口，故民軍戰志仍頗高昂。十一月十一日，袁又派劉承恩與蔡廷幹透過英國領事介紹，到武昌議和，民軍內部反對議和，主張武力解決之論仍多。如胡鄂公認為：

革命是用武力和各種手段將敵人打倒，萬不可與之言談和平二字。故袁世凱來信言和，是袁欲假和議以劫持清帝而便於私圖，我們應認為是袁世凱之陰謀。：前次拒絕劉承恩不見，在各方面所得影響甚好，故此次決不可招待也（註五六）。

註 五四：同註十六，頁一七二。

註 五五：胡鄂公：《湖北首義三十五日記》，《湖北文獻》第十七期，頁二六。

註 五六：同前註。

他又強調湖北起義是革命，各省響應是響應革命。湖北若與清軍戰爭愈堅決，響應者必愈多。所以湖北要以革命為各省倡導，唯有革命愈堅決，戰爭愈激烈，愈不和平，則影響愈大。反之一有接近和平之嫌疑，湖北起義之作用就喪失，革命亦必因之失敗。

軍政府幹部後雖決定加以接待，但見面時，黨人之態度仍甚激烈。孫武、吳兆麟、張振武等均在座，見所開條件有君主立憲一條，大眾都表示反對。「府中職員朱樹烈、陳磊、甘績熙、范義俠等都抽出指揮刀，喝道：誰主和，誰吃刀。」（註五七）各部長俱起而罵項城之無人格，譏兩使無價值。蔡、劉失意而去（註五八）。另外，代表革命黨喉舌的上海民立報亦連續發表「議和駁謬」、「和平解決之殷鑑」等社論，慷慨陳詞：「和平解決之終了，即野蠻專制之發端」，「如有主張和議者，即為黃帝之罪人」。（註五九）主持戰局的黃興也充滿信心，將奪回漢口，不考慮和議。他說：「兵貴神速，我早做準備，我負擔任，決心在我，無論何人不得干涉」。（註六〇）戰志昂揚，準備驅逐韃虜，是湖北民軍幹部的心情。所以在這個階段，南北議和是無從進行的。

但經反攻漢口一役，民軍弱點盡露，三位指揮官，兩位違令被處死，一位醉酒誤事遭撤職。清軍隨即渡河來攻，民軍再敗，漢陽失陷，軍事局面全非，情勢乃急轉直下。黃興主張撤棄武昌，東下進攻南京，大受湖北黨人抨擊，次日離鄂東去。北洋隔江向武昌發砲，都督府中彈起火，城內一片混亂。外電則稱革命軍士氣低落，黎元洪都督準備接受立憲政府（註六一）。革命軍銳氣既失，於是袁世凱安排停戰、勒索條件皆轉得心應手。革命軍既力有不迨，又急於傾覆清廷，則從袁所欲以行倒滿的政治交易遂為形勢所趨矣。

註五七：同註十二，頁四五九。

註五八：《袁世凱敢言和平》，《民立報》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註五九：《民主報》，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日、十一月六日。

註六〇：同註二十。

註六一：同註十二，頁四六〇。

清軍攻陷漢陽後，馮國璋欲乘勝攻武昌，袁以長途電話阻之，旋改命段祺瑞接掌敵前軍事，接著透過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指示英國駐漢口領事安排停戰。十二月一日，英領事派漢口萬國商會會長盤恩帶了停戰三天的公文到武昌，請民軍認可，並蓋上都督印信，以便執行。黨人當即表示同意。但這時黎元洪已離城出走，印信也帶去，匆促間，黨人一面備餐款待盤恩，一面急找刻印工人照樣刻了一顆，蓋了作數。盤恩當晚渡江回漢口，黨人蔣翊武、吳兆麟將此事報告黎元洪，「黎都督聞已停戰，喜出望外」。（註六二）可見軍政府戰志全失，急於和談。以後停戰三天期滿，繼續延長，武漢戰事就此停止，革命轉為政治解決了。

軍事上，袁無意進攻，民軍則戰意已失，故停戰實現。至於政治解決，隨之也有了頭緒。蓋黨人革命目的首在推倒滿清，建立共和之民國，現在難憑武力實現，而袁既無意效忠清廷，且民軍聲勢已大，華中、華南各省皆已獨立，要以武力摧毀，亦為形勢所難。所以，只要能滿足他那比內閣總理更高的權力野心，出賣滿清孤兒寡婦，在袁世凱的實力與感情而言，並不成為問題。於是由于袁倒滿，以袁為民國總統的安排，就成南北美好的政治利益交集了。

漢陽戰役前，黎元洪曾告訴袁世凱所遣的議和代表劉承恩、蔡廷幹說：「若項城現率所部轉取冀汴，尚不失為都督，將來大功告成，公舉總統時，以項城威望，或可當選」。（註六三）這當然不合袁的心意。等到袁組織內閣，釋放汪精衛，汪以解決大局自許，而有聯袁倒清的計劃，並與袁世凱之子克定相結而通於袁。接著留日黨人朱芾煌歸國，亦奔走彰德京津間，說袁氏父子響應共和，許袁以總統之位。至漢陽陷落，民軍銳氣已失，機會遂告成熟。朱芾煌受袁派遭到武昌，攜有汪精衛之函，云：「約南北聯合，要求清帝遜位，並擬舉袁為臨時大總統。」黎即開會討論。民軍既無力再戰，衆人遂同意如袁實行南北聯合，推倒滿清政府，彼等願舉袁為大總統（註六四）。和議方針遂定。

註 六二：同註十六，頁三七二。

註 六三：同註五八。

註 六四：蔣永敬：《朱芾煌與辛亥南北議和》，《傳記文學》第十九卷第二期，頁三四。

另外，在參與各省獨立，響應革命的立憲派方面，在領袖張謇的策劃下，亦在佈署擁袁以建立新政治中心，各省諮詢局的立憲派議員亦同此心理（註六五）。因此，獨立各省為籌組民國臨時政府所召開的代表會，十二月十三日在漢口會議，通過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規定設置臨時大總統為元首，但該會未選舉臨時大總統以組織政府，卻產生了「袁世凱如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的決議（註六六）。同時黃興也有「中華民國大總統一位，斷舉項城無疑」的表示（註六七）。聯袁倒滿，虛總統之位以待其來，顯然已成南方之共識。

在袁多方佈署，「剿」、「撫」兼施之下，民國總統大位已十拿九穩，清廷命運也難逃其擺佈。但袁仍要做得堂皇圓滿，絕對的把握。於是十二月十日起，由伍廷芳、唐紹儀分別代表民、清兩方的上海南北議和，表面上一度達成了召開國民會議公決國體的協議。暗中又由北洋軍密使廖宇春到上海，與黃興代表密商，成立確定共和國體、推覆清室者為總統，優待清室等重要協議（註六八）。至此，辛亥革命已由武力倒滿轉折為民軍與袁世凱互相妥協交易。而此變局溯自漢陽之陷，不過半月而已。漢陽之敗，對辛亥革命之影響，不可謂不巨。

由於逼退清廷尚須週折，而南方亟須成立政府以統籌大局。故孫中山十二月二十五日歸國抵達上海，二十九日，被選為臨時大總統，組織政府。袁以為被欺，大為惱怒，遂推翻唐紹儀與伍廷方的協議，南北議和停頓。但政治解決之門並未關閉。孫本人對聯袁以速成民國，曾有類似表示。十一月中旬，他在歐洲致電民立報說：「欣悉總統自當選定黎君，聞黎君有擁袁之說，合宜亦善。總之隨宜推定，但求早鞏國基。」（註六九）對聯袁倒滿的策略也表肯定，他認為：

註 六五：同註五三，頁四一四。

註 六六：吳相湘：《袁世凱謀取臨時大總統之經過》，《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一冊，頁八。

註 六七：《民主報》，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註 六八：廖宇春：《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辛亥革命史料選輯》下冊，頁三二六。

袁世凱不可信，誠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餘年貴族專制之滿洲，則賢於用兵十萬（註七〇）。被選為臨時大總統後，深知袁之猜疑，孫又馳電解說，強調東南諸省久缺統一機關，行動困難，故以組織政府為必要條件，所以才「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並請袁「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註七一）另又透過與袁有密切關係之張謇致電袁氏，以堅其心，表示「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註七二）因此這時以民國總統之位，交換袁逼退清帝，仍是民軍領導核心的想法。在革命領袖的表白與立憲名流的疏通下，袁初仍未釋然，乃嗾使北洋將領聯銜通電主張死戰以維君主立憲，作為恫嚇南方之態。但大局並未變動，轉而進行清帝退位及臨時大總統更迭的折衷安排。

在南北交涉期間，湖北以外的光復各省曾出現一些主張北伐與反對議和的呼聲。十二月五日，上海有北伐聯合會的成立。此外，各省領袖、海外華僑也紛紛通電，反對議和，要求北伐。以免徒中奸計，貽誤大局。繼而更有廣東北伐軍開抵上海，準備行動（註七三）。在這種北伐呼聲高漲的影響下，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和部分黨人也認為把建立民國的大任付託袁世凱是靠不住的。革命黨人應有勇氣、有決心率領南方起義將士繼續奮鬥，趁此全國人心傾向革命的時候，必然勝利可期。此時多費些氣力掃除障礙，在新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國家，將是事半功倍的（註七四）。因此，元月四日，孫總統電令廣東都督陳炯明出兵北伐，強調「和議無論如何，北伐斷不可懈」。（註七五）接著宣佈自任北伐總指揮，以黃興為陸軍總參謀長，「擬俟和議決裂後，親統大兵北伐」（註七六）。似

註 六九：《民立報》，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註 七〇：《胡漢民自傳》，《革命文獻》第三輯，頁四二六。

註 七一：《國父全集》，第四冊，頁一四四。

註 七二：李守孔：《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後清帝退位之交涉》，《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十二卷第一期，頁五九。

註 七三：金沖及、胡繩武：《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頁一五九。

註 七四：李書城：《辛亥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湖南文獻季刊》，第三卷第三期，頁三五。

註 七五：《孫中山全集》，第二冊，頁七。

乎很有實行革命方略的決心。可惜臨時政府的弱點是多方面的。軍事上，革命軍多為臨時招募，戰力難以自信。雖然粵軍姚雨平曾擊敗清將張勳於皖北，但此非北洋勁旅，而原已獨立的山西、陝西則多為北洋軍所佔。財政上，各省極少解款，借債不能成立，餉費無著。加以列強明顯袒袁，立憲派亦盼和甚殷，亟欲與袁妥協（註七七）。而更重要的是具有實際戰場經驗的另一領袖黃興在漢陽一役的挫折下，已無打敗北洋軍的信心，因而傾向政治解決，不願再冒戰爭的危險。他和另一部分黨人認為袁世凱是個奸黠狡詐，敢作敢為的人，如能滿足其欲望，他對清室是無所顧惜的。否則他也可以像曾國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國搞垮一樣，未搞垮革命軍。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復的半壁河山奉還漢族，我們給他一個民選的總統，任期不過數年，可使戰爭早停，人民早過太平日子，豈不甚好。如果不然，他會是我們的敵人，如不能戰勝他，我們不僅得不到整個中國，連現在光復的土地還會失去也未可知（註七八）。黃興等人的顧慮是有依據的，蓋北洋軍乃袁一手組建而成，軍官都是他拔用的舊部，一向只知有袁宮保，不知有大清朝。而北洋軍的實力據明瞭清末軍事情況的人指出：

清末練新軍，僅北洋練有六鎮。各省亦練有新軍，而獨北洋著稱於時者，其原因可略言之。清末練新軍時，以北洋六鎮配備最好，槍炮彈藥皆最新購自外國者，效能極強。各省新軍名為洋操洋械，但與北洋六鎮相比，則又多為粗劣舊械，故實際力量相去甚遠。北洋六鎮在編練之始，：選擇極嚴。：而各省多係舊兵改練，即新招者亦未經過嚴格之甄別，故士兵之本質亦不同。：北洋當時選聘外國知名軍人充當教習，尤其中下級軍官多半熟習新操新制。各省之督撫統領或則敷衍塞責，或則對新軍所知不多，故訓練之認真與敷衍有極大差別。北洋六鎮軍費充沛，故官兵軍餉較他省為高。：綜上所述，北洋新軍與各省新軍實有不同。加以各省互不相屬，勢力分散，不能統一，以六鎮訓練有素而裝備待遇有極大不同之北洋新軍與各省一鎮或一、

註 七六：《民立報》，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註 七七：同註五三，頁四二〇。

二協相較量，強弱之勢，非常明瞭（註七九）。

在這種情況下，北伐徒託空言，黃興因而憂憤稱：「和議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動員令，惟有切腹以謝天下」。

（註八〇）孫中山雖「始終不願妥協」，但在「內外負重要責任之同志則悉傾向於和議」（註八一）之下，只有迫於時勢，同意讓步，而痛心於革命方略之不行了。所以，漢陽一役，民軍挾首義主力之銳氣及領袖黃興之督師，而為北洋軍所敗，南北強弱既判，不但使黃興失北伐之志，孫中山的革命方略亦被迫放棄。

四、漢陽戰敗對民國臨時政府組織的影響

武昌革命，事起倉促，當時革命領袖不在，起事組織的負責人或傷或逃，因而黨人臨時推擁清軍將領黎元洪為都督，組織湖北軍政府。革命剛一開始，黨人就將革命政權的領袖交給非革命黨擔任。黎元洪勉強出任都督，但處事並不積極，藉口兵力單薄，列強不准在租界周圍十里內開砲為由，未採納黨人制敵機先，佔領武勝關、驅逐漢口清軍的建議（註八二）。不久清軍南下，漢口戰事緊張，這時黃興到武漢督戰，黨人對他期望殷切，想藉其威望負責指揮戰局，黃也勇於任事。遂於漢口陷後，由黎元洪登壇拜將，任命黃興為戰時總司令。這樣黎元洪已確立了湖北軍政府最高領袖的地位。其後響應革命，宣佈獨立的省日多，以彼此行動不相聯屬，亟須建立統一機關，故有組織臨時政府的倡議。十一月中旬，各省代表陸續到滬，召開會議，決定公認湖北軍政府為民國中央軍政府，即以武昌都督府執行中央政務。於是黎以湖北都督又取得籌組民國政府的優越地位。實際的革命領袖反處於從屬被動的情

註 七八：同註七四。

註 七九：張國淦：《北洋軍閥的起源》，《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上冊，頁七〇。

註 八〇：同註七〇，頁四三二。

註 八一：同前註。

況。

黃興以革命核心領袖的身份，不計權力名位，勇於任事，屈居臨時靠攏革命的黎元洪之下，督師力戰清軍銳師，如果戰爭獲勝，勳業遂立，不但能提高威望，天下歸心，確立更突顯的領袖地位，更能強化革命領導的權威，整合分散的革命勢力，有助革命大局的發展。可惜在主、各觀條件限制下，黃興雖全力以赴，苦撐近月，終為北洋軍所敗，漢陽失陷，這不但對黃氏的勳望造成嚴重的打擊，而且使民軍內部產生了矛盾，連帶遲滯了臨時政府的建立。

當黃興督戰漢陽時，上海光復，黨人陳其美出任都督，各界曾推代表來鄂，促請黃興到上海，統率軍隊，攻取南京。黃興以武漢吃緊，仍留漢陽督師（註八三）。及漢陽失陷，黃興在湖北軍政府會議報告戰事失利情形，在座者對黃表現十分不滿，阻止其報告，並問其決心如何。黃遂表示擬棄武漢而取南京。「衆皆嘵然，場內頓起責難，紛紛抗百出，有出手槍以相向者」，黃興窘迫，退出會場（註八四）。並於晝晚渡江到漢口，次晨搭船往上海。

漢陽苦戰而陷，黃興未得湖北民軍幹部的體諒，但上海都督陳其美及下游黨人則竭誠歡迎。且在黃抵上海的次日（十二月二日），南京為民軍攻克，革命士氣復振，革命政府的組織與活動中心也由武漢下移南京。各省代表會議決議以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接著在上海的各省代表於十二月四日選舉黃興為暫定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以大元帥主持臨時政府。陳其美及江蘇都督並發起歡迎黃大元帥會。黃興初力辭其任，主張選黎元洪為大元帥。組織臨時政府，孫中山回國，可當其任。各代表則表示方今軍務倥偬，時間異常寶貴，若無臨時政府，一切交涉事宜俱形棘手。大元帥乃一時權宜之計，堅請黃興不必推讓（註八五）。至此黃興才同意暫時擔任。

黃興被選出任大元帥，主持臨時政府，顯然一方面是陳其美、宋教仁等黨人要將革命政府的領導權從武昌的黎

註 八二：同註二一，頁四一。

註 八三：同註七四，頁四四。

註 八四：同註十二，頁一九二。

元洪移轉到同盟會的黨人之手；一方面可能也是長江下游的立憲派湯壽潛、張謇等希望就近掌控臨時政府的籌建（註八六）。這是革命形勢的新契機，民國似乎將在黃興主持下肇建。民立報更以社論賀曰：黃興為共和奔走，不知幾何年。憂患不足擾，偏激非所出。光明磊落，如日經天，如水行地。選為大元帥，群龍無異議，則共和之基固矣。」（註八七）但這個新發展很快就被漢陽敗戰的影響所破壞。

黃興在接受大元帥職任後，曾一度表現積極。他電請胡漢民北上，商組織臨時政府（註八八）。但消息傳出後，在武漢的各省代表以事先未曾與聞，表示不予承認。黎元洪則乘機以中華軍政府大都督的名義致電各省，要求取消（註八九）。而江浙軍人更因攻克南京自驕，以黃興漢陽之敗，大加反對，謂「此人棄武漢而來，若令守南京，不又棄南京耶。」（註九〇）甚至有聲言不願隸於漢陽敗將之下的（註九一）。於是黃興大為消極。十二月十二日，各省代表由上海、武漢齊集南京。由於對袁世凱抱持希望，代表會不選臨時大總統，決議承認上海選出的暫定大元帥；大總統未舉定前，其職權由大元帥擔任。但是黃興在江浙與武昌軍人的輕侮下，已堅決不肯就職，十七日，正式通電力辭暫定大元帥，建議改推黎元洪擔任。代表會為解決難題，乃改選黎為大元帥，駐武昌；黃為副元帥並代行大元帥職權，組織臨時政府（註九二）。並派代表到上海迎黃赴南京。但黃興仍堅辭不就。二十一日，黎元洪通電接受大元帥的名義，並委黃興代行職權，而黃依然不肯接受。至此民國臨時政府的組織乃成僵局，無法進

註八五：《民立報》，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註八六：同註十二，頁四九〇。

註八七：《民立報》，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註八八：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稿》，《中國現代史叢刊》第四冊，頁二。

註八九：《黎副總統政書》，見李雲漢前引文頁二八二。

註九〇：沈雲龍：《張謇、程德全對辛亥開國前後之影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頁二七二。

註九一：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頁二〇三。

註九二：《革命文獻》，第一輯，頁八。

行。直到十二月二十五日，孫中山返國抵滬，二十九日被選為臨時大總統，次年元旦赴南京就職，民國臨時政府始告肇建。可見漢陽敗戰的影響不但破壞了黃興擔任大元帥，民國臨時政府的組建也因之延遲了近月之久。

此外，由於漢陽敗戰，也引發了革命陣營的人事矛盾，有了寧、鄂分歧的現象，破壞了革命陣營的整體勢力。蓋黃興以革命重要領袖，不計名位，屈居黎元洪之下，督率民軍，力抗北洋銳師，雖撐持陽夏近月，終不免敗退武昌，武昌革命幹部未加慰勉與諒解，反在軍事會議上，大加責難，黃興深感難堪，當夜渡江到漢口，次日離鄂東下，可說不歡而散，且互有惡感。數日之後，上海各省代表選黃興為暫定大元帥，武昌又公開反對，因此嫌隙益生。後又改選黎為大元帥，黃為副元帥，黃亦堅持不受。這段期間，黃興與下游立憲派名流接觸，政治態度亦趨向溫和，不治於激進莽烈之黨人。胡漢民曾評此事說：

克強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及漢陽督師，聲名洋溢於黨內外。顧性素謹厚，而乏遠大之識，又未嘗治經濟政治之學，驟與立憲派人遇，即歎然自以爲不如。環視同黨，尤覺暴烈者祇堪破壞，難與建設。：既引進張、湯爲縉紳之望，楊度、湯化龍、林長民等，方有反革命之嫌疑，亦受克強庇護，而克強之政見亦日以右傾（註九三）。

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歸國僅數日，獲選為臨時大總統，於是在組織政府的人事安排與重要決策方面，無論就國內形勢的熟悉與人脈關係的接觸，都自然而然相當尊重黃興的意見，故有「孫執政，事事求教於黃興」之說（註九四）。結果政府各部人事發表，九位總長中，只有三位為同盟會會員，分別是陸軍總長黃興、外交總長王寵惠、教育總長蔡元培。餘為立憲名流與響應革命的舊官僚。但總長中，既無湖北人士，各部次長中，也無一為武昌首義之民軍要角，遂引起部分湖北黨人不滿。尤其孫武原為共進會會長，武昌新軍籌劃起事，被推為武漢革命軍參謀

註 九三：同註七〇，頁五八。

註 九四：同註九〇。

長，三鎮光復，任軍政府軍務部長。其人「志大才疏，學識亦不足以濟之」。（註九五）在武昌軍政府中，傲慢跋扈、排斥異己、挾黎自重、恃功而驕（註九六）。孫中山組織臨時政府時，孫武到南京活動。欲為陸軍部次長，所謀未遂，即憤恨回鄂，攻擊孫、黃。旋糾集部分黨人，成立民社，擁黎元洪為領袖，與同盟會對立。黨人張繼記其事說：

（臨時）政府成立，以一般老官僚任總長，以本黨同志任次長，而忽略武漢起義諸同志如孫武等，以致產生寧、鄂分離之象（註九七）。

民社於民國元年一月十六日在上海成立，並創辦「民聲日報」為機關報。該社雖聲稱其宗旨是「本盧騷人民社會之旨」，「對於統一共和政治持進步主義，以謀國利民福」。（註九八）實際上，該社一方面是挾失意之怨，專與南京臨時政府作對。如民社議員在臨時參議院中反對臨時政府提出的借款合同（註九九），民聲日報則公開主張取消參議院（註一〇〇）。該社議員劉成禺甚至辱罵孫中山為海賊。另一方面則捧黎擁袁，以圖升官發達（註一〇一）。可見漢陽敗戰，不但直接造成革命領袖與武昌黨人的隔閡，進而影響革命政府的人事佈局，造成寧、鄂矛盾，分散了革命力量，妨礙了革命的發展。

註 九五：同註六，頁三九八。

註 九六：同註十二，頁一五五。

註 九七：張繼：《五十年歷史之研究與回顧》，《張溥泉先生全集》，頁三二〇。

註 九八：《天鐸報》，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同註七三，頁六七。

註 九九：《民立報》，一九一一年三月一日。

註一〇〇：《民聲日報》，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同註七三，頁二一一。

註一〇一：萬鴻啓：《民社成立與黎袁勾結》，《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二集，頁一〇七。同註七三，頁六七。

五、結論

綜合上述，可知在武漢新軍發動起事，佔領三鎮之後，清廷即以北洋新軍之主力南下攻剿，並重新起用創練北洋新軍的袁世凱為欽差大臣，期能發揮戰力，平服革命。而革命領袖黃興亦間關赴難，親臨武漢，督師抗戰。但由於湖北新軍之規模、武器裝備、戰陣訓練皆遜於北洋軍，且參與革命者不過數千，臨時增募之新兵則缺臨敵經驗，外省援軍又未積極效命。故在漢口陷後，又經近月熬戰，民軍再敗，漢陽亦失。黃興遭敗戰之憾。

漢陽一役，實為北洋軍與革命軍主力之戰。此役既敗，黨人遂失去以武力倒滿的信心，從反對和議的強硬態度，轉而採聯袁倒滿之策，而以民國總統為交易之條件，加以立憲派與響應革命之舊官僚亦傾心於袁，遂使孫中山在就任臨時大總統後，雖頗欲行其革命方略之北伐計劃，終以衆志難違，被迫放棄。滿清固倒，政權則入袁之手。

另外，由於漢陽敗戰，黃興之領袖威望受損，且不獲湖北民軍幹部諒解，窘迫離鄂東下，以致雖獲各省代表會議選為大元帥，卻遭湖北民軍要人及江浙將領的反對，不得其任，因而延遲了民國臨時政府的組建。至孫中山組織臨時政府，武昌民軍要角又以此隔閡，未獲顯職，遂憤而別立民社，專與南京政府之孫、黃對立，形成寧、鄂矛盾，破壞了革命勢力的團結與發展。由是可知，孫中山憾恨革命方略不行，致革命頓挫，民國板盪，這固然有許多錯綜複雜的背景，但漢陽敗戰之為關鍵因素，當為吾人所認識。